



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第 1 卷第 1 號 2017 年 8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日本對外政策之中的亞洲區域主義

——從自民黨政權到民主黨政權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I
■ 論文	
前言	1
戰後日本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	3
安保再定義與日本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	7
民主黨政權的東亞共同體主張與政策	10
結論	16
■ 附記	i
■ 作者簡歷	ii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戰後日本的自由民主黨與民主黨在執政期間推動有關亞洲區域主義的相關對外政策時，其理念與實踐有何異同。日本民主黨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勝而達成政黨輪替，由於過去民主黨批判自公政權的對外政策重美輕亞，導致其提倡的東亞共同體構想被質疑為反美。不過自民黨政權早已推動了亞洲區域主義的相關政策，過去的研究也指出，日本至少在追求亞洲區域主義與美日同盟的互補或平衡。那麼應如何觀察民主黨的政策？其與自民黨政權時期有何異同？本文檢討了戰後日本對外政策之中的亞洲區域主義後發現：自民黨執政期間以美日關係為考量推動相關政策，並為了穩定日中關係，希望將中國引導入亞洲區域主義，只有小泉首相在日中關係的態度較為例外；無論是鳩山首相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或是日本對外政策基礎的美日關係、同為重要關鍵的日中關係，民主黨執政期間所推動的政策不但沒有達成具體的成果，從過程中反而可以看出民主黨對相關政策並沒有系統性的規畫與思考，導致了鳩山政權期間美日之間失去互信，甚至連日中關係也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發生了影響至今的對立；菅、野田政權最後重返了過去自民黨以對美外交為核心的方針，代表日本任何政黨執政，都難以改變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對外政策架構。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gap between the rhetoric and practice of Asian regionalism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administrations. Its finding i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in power, it is difficult for Japan to move away from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the cor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Early on, the LDP developed Asian region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sought also to absorb China into this region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rhetoric changed under the DPJ administration. Although the party declared an intention to promote Asian regionalism prior to its electoral victory in summer 2009, its subsequent policy was incoherent and did not envision a clear role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fact, soon enoug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anaged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Japan and its staunch postwar ally. Japan's relation with China also deteriorated under the DPJ administration due to the Senkaku Islands dispute, forcing eventually the DPJ to returning to postwar Japan's principle regional policy centered completely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日本對外政策之中的亞洲區域主義：

從自民黨政權到民主黨政權

黃偉修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日本第 45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以下依照舉行的時間簡稱為 2009 大選）於 2009 年 8 月 31 日舉行，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得 308 席的過半數席次，擊敗了執政的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為自民黨）、公明黨的聯合政權而達成政黨輪替，民主黨黨代表（黨魁）鳩山由紀夫當選首相，並與社會民主黨、國民新黨組成聯合政權¹。由於這是 1955 年以來首次由非自民黨的政黨在眾議院單獨過半，所以民主黨政權的政策走向受到各方注目²。

其中民主黨最受國際矚目的對外政策主張就是推動建立「東亞共同體」。由於民主黨於在野期間批評自民黨政權的對外政策是重美輕亞³，因此民主黨雖然在政黨輪替前不斷強調美日同盟與亞洲外交並重，但其「東亞共同體」構想仍被日本媒體解讀為是為了對抗自公政權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政策⁴。而美國對亞洲的區域合作雖然是態度搖擺不定，但對民主黨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則是有所疑慮⁵。

¹ 本文將 1955 年到 2009 年 9 月 15 日期間由自民黨單獨執政，或自民黨與公明黨、自由黨、保守黨等小黨組成的聯合政權簡稱為自民黨政權，2009 年 9 月 16 日至 2010 年 6 月 8 日的鳩山由紀夫內閣簡稱鳩山政權，2010 年 6 月 8 日至今的菅直人內閣簡稱菅政權，2009 年 9 月 16 日之後的時期則簡稱民主黨政權。

² 1993 年 8 月到 1994 年 6 月之間曾有細川護熙、羽田孜兩個非自民黨聯合政權，不過自民黨在 1993 年 7 月的第 40 屆眾議院大選中雖未過半，但在 511 的席次中保有 223 席，仍是眾議院第一大黨。相關數據可參閱石川真澄、山口二郎，《戰後政治史 第三版》（東京：岩波書店，2010 年），頁 254。

³ 例如小沢一郎、菅直人，《政權交代のシナリオ：「新しい日本」をつくるために》（東京：PHP 研究所，2003 年），頁 53-72。〈民主、政權交代をアピール：岡田代表「アジア重視」、小泉政權と差別化〉，《日本經濟新聞》，2004 年 12 月 19 日。〈民主党「小沢色」外交で発信〉，《朝日新聞》，2009 年 2 月 25 日。

⁴ 〈民主外交、板挟み 米に配慮、社民反発 総選挙で政權交代視野に〉，《朝日新聞》，2009 年 7 月 24 日。〈日米 マニフェスト点検、米 警戒まじり注目〉，《読売新聞》，2009 年 8 月 6 日。〈マニフェスト最終点検、成長・財源どう両立：外交・安保、自民、日米同盟を強化〉，《日本經濟新聞》，2009 年 8 月 30 日。

⁵ 美國對亞太區域合作的態度可參閱 Richard J. Samuels and Christopher P. Twomey, “The Eagle Eyes

不過，過去最常被民主黨批評為重美輕亞的小泉純一郎首相卻是第一位表態推動東亞共同體的日本首相⁶。小泉首相任內也與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涵蓋範圍比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更為廣泛的「經濟伙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⁷。而日本在 2007 年與泰國、印尼，2008 年與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簽署的 EPA 也是小泉政權時期開始進行的政策⁷。從這些成果可以看出，東亞共同體在內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並不一定帶有反美的意涵，以重美輕亞來概括小泉政權、自公政權甚至自民黨執政期間的對外政策也太過單純。

同時，美日關係無疑是日本的對外政策的核心與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也有學者指出，過去自民黨執政期間至少尋求亞洲區域主義或聯合國中心主義等多邊合作與美日同盟之間的平衡或互補⁸；也有學者批評日本堅持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安全政策而不重視亞洲的區域多邊安全合作，但同時也肯定日本在亞洲的多邊經濟合作上扮演了積極的角色⁹。

那麼日本過去是如何推動亞洲區域主義的相關政策？民主黨的主張與自民黨政權時期有何異同？再者，鳩山首相辭職後，繼任的首相菅直人、前外務大臣的民主黨幹事長岡田克也（相當於我國的黨秘書長）等民主黨主要領導人都曾提出類似的主張¹⁰。菅首相也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於國會的所信演說（相當於我國行政

the Pacific: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ptions in 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in Michael J. Green,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3-20.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in East Asia: Power, Markets, and Grand Strategy”, in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7-54. 伊藤剛，〈「日米同盟の「主体」と「客体」〉，武田康裕、丸山知雄、巖善平編著，《現代アジア研究 3：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 年），頁 51-70。大矢根聡，〈アメリカの多国間主義をめぐるサイクル〉，大矢根聡編，《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多国間主義の地平》（東京：有信堂，2009 年），頁 228-254。美國對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主張的疑慮可參閱以下報導：〈米抜きアジア連携に警戒 トン・米高官、APEC 主導強調〉，《朝日新聞》，2009 年 10 月 16 日。〈米紙 目立つ鳩山政権批判〉，《読売新聞》，2009 年 10 月 28 日。〈鳩山対米外交、軸足はどこに、盧・韓国前政権と類似点？〉，《日本経済新聞》，2009 年 11 月 8 日。

⁶ 首相官邸，〈小泉総理大臣の ASEAN 諸国訪問における政策演説〉，《首相官邸》，2002 年 1 月 14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2/01/14speech.html>〉。

⁷ 外務省，〈日・ASEAN 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treaty169_15.html〉；経済産業省，〈我が国の EPA/FTA〉，《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08/2008honbun/html/i4320000.html>〉。本文引用的所有網址皆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確認。

⁸ 例如西原正，〈アジア太平洋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の枠組みと日本〉，《国際問題》，第 480 号，2000 年 3 月，頁 38-52。田中明彦，〈新しい中世：相互依存深まる世界システム 文庫版〉（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3 年），頁 277-309。伊藤剛，〈同盟の「拡大」と「多元化」：東アジアの潜在的脅威への対処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国際政治》，第 135 号，2004 年 3 月，頁 11-23。

⁹ 天兒慧，〈中国・アジア・日本：大国化する「巨龍」は脅威か〉（東京：筑摩書房，2006 年），頁 157-163。

¹⁰ 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3〉（東京：民主党，2003 年），頁 37。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4〉（東京：民主党，2004 年），頁 18。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5〉

院長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表明，將推動參與「環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談判，以建構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來促成東亞共同體的成立¹¹。顯示民主黨執政期間，東亞共同體可能還是主要的對外政策議題，那麼菅首相以及之後的野田佳彥首相在相關政策的推動上，與鳩山政權期間有什麼不同？

此外，雖然民主黨已經下台，但為了理解日本對外政策之中有關亞洲區域主義政策的發展，有必要對此研究問題加以分析，並以此為基礎檢證民主黨執政期間有關東亞共同體主張與政策，以探討日本的對外政策是否具有延續性，以及自民黨與民主黨執政期間的政策異同。

本文首先分析戰後到冷戰期間，其次此外，美日同盟雖然是日本對外政策之中最重要雙邊關係、核心，但由於本文的分析焦點是日本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因此在進行分析時不一定直接論及同一時期的美日關係。

二、 戰後日本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

（一） 戰後到冷戰期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戰敗國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對外政策除了對美關係以外，就是設定其在亞洲的角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外務省調查局邀請了經濟界與學界人士、官僚組成了「外務省特別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為特別委）」進行研究。由於蠟山政道、平貞藏、大來佐武郎、杉原荒太等主要成員都曾經參與二次大戰期間影響了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昭和研究會」的相關活動，因此其焦點仍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區域主義¹²。但特別委也記取了日本當年為了從東亞排除歐美各國的勢力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教訓，由大來等人負責執筆的報告書即指出：「今後日本經濟有逐漸依賴美國的趨勢，但是應該避免完全依賴美國經濟，因此需要維持與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而美國也不可能切斷與東亞的經濟合作，最終應該會走向與東亞經濟相結合的方向；從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日本不需要再考慮軍事層面的狀況下，過去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為基礎所推動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的政策已經沒有意義，今後日本的工業發展方向不應該排除美國，而是與美國

（東京：民主党，2005 年），頁 22。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7》（東京：民主党，2007 年），頁 28。

¹¹ 首相官邸，〈第 176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10/01syosin.html>〉。

¹² 中村隆英、大森とく子編，《日本經濟再建の基本問題：資料・戦後日本の經濟政策構想第一卷》（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頁 51。大東亞共榮圈與昭和研究會可參閱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

合作並以互補的方式與東亞地區相結合，以朝向對美國、日本、東亞各國都有利的方向前進」¹³。渡邊昭夫等學者就認為，日本在戰後即是基於特別委員會提出的「開放式區域主義」的思想推動了亞洲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¹⁴。

此外，當時美國的冷戰戰略除了政治與軍事手段以外，也透過經濟援助協助非共產國家經濟復興，防止其遭到共產主義滲透。而日本透過推動「開放式區域主義」不僅可以與當時被視為是亞洲經濟復興的核心地區：東南亞國家加強經濟合作關係，也可以減輕美國的負擔¹⁵。

當時日本推動的一連串政策主要有：鳩山一郎政權的「亞洲決算同盟（アジア決済同盟）」、「地區開發基金（地域開発基金）」，岸信介政權的「東南亞開發基金構想（東南アジア開発基金構想）」，池田勇人政權的「日太平洋友好帶的構想」，佐藤榮作政權促成的「東南亞開發閣員會議（東南アジア開発閣僚會議）」。¹⁶可是這些日本為了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所提出的政策不是無疾而終，就是達成的成果有限。例如日本在萬隆會議之中完全淪為配角，東南亞開發基金的構想不被東南亞各國接受，1966年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東南亞開發閣員會議在1974年後無疾而終。只有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設立能稱得上是成功，但是日本爭取將ADB總部設於東京的計畫則失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當時東南亞各國內部不僅存在著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因為二次大戰的經驗而不希望由日本主導區域經濟合作。所以當時的成果僅限於日本基於戰爭賠償而建立的雙邊經濟援助關係¹⁶。

不過基於「開放式區域主義」所推動的政策與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援助不僅強化了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關係，更促成了「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成立。美日從1980年代開始就因為農產品、汽車、半導體等貿易問題出現摩擦，加上歐洲統合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進展也開始加速，通商產業省（以下簡稱為通產省）擔憂日本會被排除於美國與歐洲市場，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基於「開放式區域主義」與美國推動橫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大區域」的經濟合作機制。美國最初雖然抱持著懷疑的態度，ASEAN 各國也對美國的參與保持警戒，但是美國、澳洲、

¹³ 中村隆英、大森とく子編，前掲書，頁200。

¹⁴ 渡邊昭夫，〈戰後日本の出発点〉，渡邊昭夫編，《戰後日本の對外政策》（東京：有斐閣，1985年），頁11-28。井上寿一，〈戰後日本のアジア外交の形成〉，《年報政治学》，1998年号，1999年，頁129-147。波多野澄雄，〈戰後アジア外交の理念形成：「地域主義」と「東西のかけ橋」〉，《国際問題》，第546号，2005年9月，頁54-57。

¹⁵ 天兒慧，《日本の国際主義：20世紀史への問い》（東京：国際書院，1995年），頁89-92。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1950～2005》（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7年），頁1-6。

¹⁶ 井上，前掲論文。大庭三枝，《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境界国家日豪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模索と地域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保城広至，《アジア地域主義外交の行方：1952～1966》（東京：木鐸社，2008年）。

ASEAN 最後都接受了通產省的提案，最終促成了 1989 年 11 月召開的第一次 APEC 閣員會議¹⁷。APEC 的成立可以說是日本在戰後推動區域經濟主義的最大成果。

此外，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日本也注意到中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早在戰後就意識到中國大陸在重建日本經濟時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是親美的吉田茂政權或反共的岸政權，也都以政經分離的方式推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¹⁸。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時，日本更認識到，使中國不在國際間遭到孤立，並將其引導入國際體系，才有助於區域的穩定。大平正芳首相所提出的「環太平洋聯合構想」、海部俊樹首相提出了「世界之中的日中關係（世界のなかの日中関係）」並率先解除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對中國實施的經濟制裁，都是基於這個思維¹⁹。

（二）後冷戰時期

進入後冷戰時期，亞洲地區的區域合作開始加速發展，一般認為此時的亞洲區域主義有兩大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除了經濟領域以外，安全領域的多邊合作也開始發展。過去亞洲地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就曾有嘗試推動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的努力，不過都沒有成功。例如美國與澳洲就曾推動在亞洲成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集體安全機制，不過由於美國與日本對於重新武裝日本（再軍備）的問題無法取得共識，加上亞洲各國也對圍堵共產主義的問題有不同認知，因此這個構想最後無法實現²⁰。南韓的朴正熙總統在 1960 年代推動了「亞洲太平洋協議會（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 ASPAC）」的成立，希望使其成為反共的軍事同盟。不過因為南韓與中華民國以外的成員國反對，僅以論壇形式運作，最後因為受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中和解等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於 1972

¹⁷ 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東京：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 年），頁 175-212。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東京：千倉書房，2010 年），頁 359-364。Takashi Terada, "Directional leadership in institutionbuilding: Japan's approaches to ASEA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CC and APE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2, May/June 2001, pp. 208-213.

¹⁸ 相關的討論可參閱：井上，前揭論文。陳肇彬，《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1950 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王偉彬，《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1950 年代を中心にみた国交正常化へのプロセス》（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年）。

¹⁹ 渡辺昭夫，《アジア・太平洋の国際関係と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頁 98-125。中居良文，〈日中関係：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協調と相克〉，高木誠一郎編《脱冷戦期の中国外交とアジア・太平洋》（東京：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00 年），107-116 頁。高原明生，〈東アジアの多国間主義：日本と中国の地域主義政策〉，《国際政治》，第 133 号，2003 年 8 月，頁 67-69。

²⁰ 中西寛，〈戦後アジア・太平洋の安全保障枠組みの模索と日本：一九四九～五一〉，《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 16 号，1994 年，頁 69-104。

年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後無疾而終²¹。所以冷戰期間，亞洲地區的安全合作僅限於以美國與多個國家的雙邊安全同盟關係。不過進入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出現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朝鮮半島能源開發機構（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以中國為中心的上海合作機構（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等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為了解決北韓的核問題而召開的六方會談也被期待可以發展為東北亞地區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²²。

第二個特徵則是存在著多個成員、功能重疊的多邊合作組織。例如 APEC、ARF、東協十加三（ASEAN Plus Three, ASEAN+3）、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這些組織基本上以東協、日中韓三國為主體，印度或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亞洲以外的國家則依組織的屬性參與。從功能來看，雖然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可以說只有 ARF，不過如 APEC 也被期待可以發展為區域安全合作的機制²³。ASEAN+3、EAS 雖然並不討論軍事安全問題，但卻廣泛的討論經濟安全、人類安全、非傳統安全問題²⁴。

不過這些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都僅具對話或論壇的功能，因此日本在後冷戰時期雖然也重視多邊安全合作，但仍然堅持維持美日安保體制²⁵。例如澳洲與加拿大曾在 1991 年提案設立類似歐洲安全合作組織（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的機制。但是海部政權的外務大臣中山太郎在當年的東協擴大外長會議（ASEAN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PMC）提案，認為亞洲地區的歷史與地緣政治情勢都與歐洲不同，與其設立新組織，不如積極利用既有的 APEC 與 ASEAN-PMC 等機制，同時也強調美日安保體制的必要性²⁶。

²¹ 大庭，前掲書，頁 195-204

²² 天兒慧，《等身大の中国》（東京：勁草書房，2003 年），頁 117-147。田中明彦《アジアの中の日本》（東京：NTT 出版，2007 年），頁 293-300。

²³ David P. Rapk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ower to block: the APEC and AMF cas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August 2001, pp. 373-410.

²⁴ 美根慶樹、青山瑠妙、植木（川勝）千可子、湯澤武、浦田秀次郎、寺田貴、伊豆山真里、白石昌也、フレデリック・ボンイエルト，〈再考、東アジア共同体〉，《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第 7 号，2010 年 2 月，頁 4-23。

²⁵ 菊池，前掲書，頁 264-278。佐藤考一，《ASEAN レジーム：ASEAN における会議外交の発展と課題》（東京：勁草書房，2003 年），頁 135-171。

²⁶ 外務省，《平成 3 年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1991 年），頁 379-386；頁 424-429。該提案通稱為「中山提案」。

三、 安保再定義與日本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

（一） 從同盟漂流到安保再定義

但是在後冷戰時期，長期以美日同盟為對外政策基石的日本也因為來自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面臨了重大考驗。

1955 年以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在 1993 年的眾議院選舉未能取得過半數席次，由新生黨、日本新黨、先驅新黨（新黨さきがけ）、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社會民主連合、民主改革連合八個小黨組成執政聯盟而取得執政權，由日本新黨的黨魁細川護熙擔任首相。

細川首相上任後首先面對的重大對外政策課題就是美日貿易摩擦。1990 年代初期，美日貿易摩擦已經成為美日關係惡化的主因。特別是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上任後，要求日本接受美國提出的具體數據以改善美日貿易逆差。貿易部長坎特（Michael Kantor）甚至主張，如果日本不願意接受美國的提案，美國就應該重新檢討美日的安全合作關係。柯林頓總統在 1994 年 2 月的美日領袖高峰會時當面要求細川首相接受美國的提案，細川首相則拒絕了這個要求。這被認為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對美國說「不」²⁷。

同時後冷戰時期初期，不僅亞洲的多邊安全合作蓬勃發展，日本也開始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因此日本國內出現了應將對外政策調整為以參與國際多邊安全合作為主的聲音，細川首相也主張應該重新調整因應冷戰的安全政策架構、預算、人事²⁸。

在這些國內外因素的相互影響下，細川首相於 1994 年初成立了「防衛問題懇談會」，邀請學界與經濟界人士、退休的資深官僚檢討安全政策的方向。懇談會於 1995 年 8 月提出了通稱為『樋口報告』的報告書，建議以「多邊安全保障合作（多角的安全保障協力）」、「充實美日安全保障合作關係的機能（日米安全保障協力關係の機能充実）」、「高效率、具信賴性的防衛力の維持與運用（信賴性の高い効率的な防衛力の維持と運用）」作為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懇談會仍然肯定美日同盟是三大支柱之中最重要的核心，但考量到必須避免國內的美日同盟派與多邊安全合作派之間的對立，因此報告書雖然仍強調日本的安全政策核心為美日同盟，但章節安排則將當時受到重視的多邊安全合作列在美日同盟之前。

可是這樣的章節安排引起了美國的知日派學者重視。例如格林（Michael J. Green）與克羅尼（Patrick M. Cronin）早已認為當時的美日同盟關係不合現狀，需要重新定義並強化美日關係。兩人在看過樋口報告的草案與最終報告後更認為，雖然報告書強調以美日關係為核心，但不僅沒有明確說明美日同盟與多邊合作之

²⁷ 五百旗頭真編，《戰後日本外交史 第3版》（東京：有斐閣，2010年），頁207-211。

²⁸ 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戰後50年の模索》（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年），頁325-326。

間的關連性，草案也比最終報告書更偏向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奈伊（Joseph S. Nye Jr.）也擔憂坎特以貿易問題將安全問題會掛鉤的作法會影響整體的美日關係。而日本國內的部分官僚在 1994 年的朝鮮半島危機發生時也警覺，因應冷戰的美日同盟架構已經無法有效處理如朝鮮半島危機等在後冷戰時期會影響日本安全的國際危機。

因此奈伊在 1994 年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後，便取得國防部長培里（William J. Perry）的支持，開始與日本防衛廳防衛局長秋山昌廣等日本的防衛政策官僚進行重新確認美日關係的作業。而 1996 年 1 月就任的橋本龍太郎首相不僅對安全保障問題有一定的認識，也非常積極處理美日在安保問題上最困難的沖繩基地問題，並與美國達成了遷移位於沖繩縣宜野灣市市中心的普天間基地的共識。

在這些基礎下，最後由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首相在 1996 年 4 月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邁向 21 世紀的同盟關係（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 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重新確認包括：美日進入後冷戰時期仍然有必要繼續維持在安全政策的合作、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維持亞太地區穩定不可缺少的關鍵、美日在區域與全球議題的合作關係等議題，這也就是通稱美日同盟或美日安保的再定義²⁹。

（二） 安保再定義對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

安保再定義雖然是屬於雙邊關係的重新定位，但其影響層面卻十分廣泛。其中日本基於美日安保共同宣言而修正了美日安保防衛指針（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通稱為新ガイドライン或被譯為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最為重要。

首先，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使得樋口報告建議的三大支柱等同於以美日同盟進行了統合。例如美日合作發展飛彈防衛系統不僅可以使日本獲得相關技術，日本也得以透過發展飛彈防衛系統而和美國、美國的其他同盟國整合防衛機制³⁰。

其次，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以「周邊事態」的方式規定了美日同盟的適用範圍，使得美日同盟的適用範圍不僅限於日本，美日同盟也因此從單純的雙邊防衛同盟轉型成為對亞洲、甚至全球領域的重要同盟關係。中國方面就認為美日同盟將轉型成為類似 NATO 的對外攻擊型同盟³¹。美日在 2005 年 2 月達成的「共同戰略目標（共通戰略目標）」之中，除了被認為是「周邊事態」的朝鮮半島與台灣海

²⁹ 本節有關安保再定義的部分皆參考自：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秋山昌廣，《日米の戦略対話が始まった：安保再定義の舞台裏》（東京：亜紀書房，2002 年）。五百旗頭，前掲書，頁 248-254。

³⁰ 神保謙〈弾道ミサイル防衛(BMD)と日米同盟：日米共同研究の政策過程と同盟の「戦略調整」〉《国際安全保障》，第 29 卷第 4 号，2002 年 3 月，頁 40-58。

³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國防》，〈http://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107.htm〉。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59-204。劉江永，《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435-466。

峽以外，也列入阿富汗反恐戰爭、伊拉克戰後復興、印度洋海嘯等問題³²。

此外，安保再定義也影響了日本的安全政策相關法令的走向，例如小泉政權即是以因應「周邊事態」而制定的『周邊事態法』的架構來規劃『反恐特措法』、『伊拉克特措法』、有事法制等安全政策法令³³。

因此單純從安全領域來看，安保再定義使美日同盟的合作範圍擴大至亞洲地區甚至全球領域，也影響了日本國內的安全保障相關法令的方向。

不過日本在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持續推動亞洲的多邊經濟合作，特別是不包含美國參與的 ASEAN+3 即是源起於橋本首相的提案。過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曾於 1990 年提出建立不包含美國在內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的構想，並在 1991 年以 EAEG 構想為基礎，提案建立「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但該構想過度的反美而引起美國的反彈，因此也未能獲得日本等國的支持³⁴。而橋本首相在 1997 年訪問東南亞各國時提出了被稱為「橋本主義（橋本ドクトリン）」的對東南亞政策時，建議日本與 ASEAN 各國領袖定期舉行高峰會³⁵。ASEAN 各國雖然考慮到與中國的關係而有所疑慮，不過在馬哈迪的協調下，1997 年 12 月召開的 ASEAN 領袖高峰會邀請了日中韓領袖參加。而亞洲金融風暴的擴大，更促成了這個機制，也就是 ASEAN+3 的定期舉行，日本也提案促成同時召開日中韓三國領袖高峰會。美國雖然沒有參與這個過程，同時美日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也在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等經濟政策上出現對立，但美國並不希望因其反對不包含美國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而導致日本從這個過程被排除，特別是中國強化與 ASEAN 的關係後更提高了這個可能性；同時亞洲金融風暴也使美國認知亞洲各國合作的必要性，因此默認了 ASEAN+3 的成立與制度化³⁶。此外，日本在過程中不斷強調美日安保體制的重要性，也使得美國不易採取反對的態度³⁷。

³² 外務省，《共同発表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外務省》，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2_05_02.html>。

³³ 〈テロ特措法が成立 自衛隊、戦時派遣へ転換 政府、基本計画に着手〉，《朝日新聞》，2001 年 10 月 30 日，1 総合。〈イラク新法、政府案固まる 活動は非戦闘地域のみ 戦争継続でも「可能」〉，《読売新聞》，2003 年 6 月 1 日。〈有事 7 法成立 危機対応に法体系構築 運用、体制に課題〉，《読売新聞》，2004 年 6 月 15 日。

³⁴ 佐藤，前掲書，頁 84-90。

³⁵ 外務省，《平成 10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1998 年），頁 186-192。

³⁶ 田中明彦，〈「東アジア」という新地域形成の試み：ASEAN+3 の展開〉，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年），頁 296-297。

³⁷ 佐藤，前掲書，頁 190。

（三）小泉政權期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

小泉首相的對外政策雖然是美日關係為核心，但其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態度上仍然延續過去的政策，也就是推動亞洲地區的雙邊與多邊經濟合作。例如小泉首相任內推動的 EPA，原本是日本在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時，除了 ASEAN+3 以外所推動的另外一項政策。小泉首相任內與新加坡所締結的 EPA 就是 2000 年 1 月進入雙邊談判的過程³⁸。小泉首相為了解決日本國民遭北韓綁架的綁架問題（拉致問題）而與北韓接觸，並且在 2002 年、2004 年兩次閃電訪問平壤。雖然日朝關係並沒有因為小泉首相的訪問而好轉，但是至少取得了包括簽署日朝平壤宣言、金正日對綁架問題謝罪、將 5 名綁架受害者及其家族迎回日本等成果³⁹。從這些發展可以看出，小泉首相似乎並沒有忽視亞洲。

不過小泉首相對中國的態度上與過去的政權不同，其將中國視為日本在領導亞洲經濟統合的競爭對手。例如 EPA 雖然是日本推動亞洲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的代表案例，但許多研究都指出，小泉首相積極推動 EPA 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和中國與 ASEAN 在 2001 年達成的 FTA 進行對抗，並和中國競爭與 ASEAN 的關係及亞洲區域經濟統合的主導權⁴⁰。更不用說因為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中、日韓關係惡化，也連帶影響到日本在推動 EAS 的過程中無法順利與中韓進行整合。縱使第一屆 EAS 最後順利舉行，但由於日中韓關係的不佳，所以無法進行深入的討論⁴¹。

四、 民主黨政權的東亞共同體主張與政策

（一）鳩山、菅首相的主張與政策

1. 鳩山政權

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理念與主張可以從民主黨在 2009 年眾議院選舉的政權公約、所發表的文章、各種演說、鳩山政權在 6 月 1 日發表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等文書之中窺知一二。

民主黨在 2009 年眾議院選舉的政權公約之中，對於東亞共同體的主張共提出三點意見。第一，以中國、韓國為中心，全力與亞洲各國建立信賴關係。第二，

³⁸ 宗像直子，〈日本の FTA 戦略〉，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編，〈現代東アジアと日本 1：日本の東アジア構想〉（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頁 139-166。

³⁹ 伊豆見元，〈小泉訪朝の意義〉，〈東亜〉，第 424 号，2002 年 10 月，頁 61-65。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頁 272-283。

⁴⁰ 高原，前掲論文，頁 68-69。波多野、佐藤，前掲書，頁 242-246。

⁴¹ 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頁 300-311。

在通商、金融、能源、環境、災害救援、傳染病對策等領域建構亞太地區的合作體制。第三，積極推動與亞太各國以及世界各國之間簽訂包括投資、勞動與智慧財產權等廣泛領域的經濟合作協定。但是在此同時，也注意不損及食品的安全與穩定供應、提高自給自足率、國內的農業與農村的發展等方面」⁴²。

鳩山首相也在政論雜誌《VOICE》發表的文章也指出：「為了這個地區的安定，希望能使美國的軍事能力能夠有效的發揮功能，但是也希望盡量阻止其強大的權力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失控。而在減少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的同時，希望使其巨大的經濟活動能夠有秩序的發展。位於這個區域的每個國家幾乎都會自然而然的提出這樣的想法。而這也就是加速區域統合的重要原因」⁴³。

這些理念都陸續反映在鳩山首相於 2009 年、2010 年所進行的施政報告、演講等談話或文件之中⁴⁴。同時，鳩山首相的外交智囊寺島實郎在解釋東亞共同體時，將美日同盟與東亞共同體的關係比喻為日本安保政策的兩個輪胎⁴⁵。因此鳩山首相似乎是希望以經濟、非傳統安全等領域的區域合作為基礎，進而在未來推動軍事安全領域的多邊合作。

2. 菅政權、野田政權

2010 年 6 月接任首相的菅直人在 7 月份的參議院選舉時的政權公約、9 月份的黨代表選舉（黨魁選舉）時將東亞共同體列於美日關係之後，在 9 月下旬的聯合國大會的演說內容也沒有提到東亞共同體⁴⁶，但是卻突然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提

⁴² 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9》（東京：民主党，2009 年），頁 22-23。

⁴³ 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祖父・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VOICE》，第 381 号，2009 年 9 月，頁 139-140。

⁴⁴ 首相官邸，〈第 64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鳩山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09/ehat_0924c.html〉、〈第 173 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10/26syosin.html>〉、〈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Yukio Hatoyama "Japan's New Commitment to Asia: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http://www.kantei.go.jp/foreign/hatoyama/statement/200911/15singapore_e.html〉、〈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1001/29siseihousin.html>〉、〈第 16 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鳩山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1005/20speech.html>〉、〈「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に関する今後の取組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006/_icsFiles/afldfile/2010/06/01/koso_east_asia.pdf〉。

⁴⁵ 寺島実郎，〈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米同盟見直しはクルマの両輪だ〉，《週刊東洋経済》，第 6234 号，2009 年 11 月 28 日，頁 97。

⁴⁶ 首相官邸，〈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H22.6.11)〉〈<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第 65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菅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9/24speech.html>〉。民主党，《民主党的政權政策 Manifesto2010》（東京：民主党，2010 年），頁 11；頁 21。〈菅氏の公約【要旨】 民主党代表選〉，《朝日新聞》，2010 年 9 月 2 日。

出將推動參與 TPP 談判的構想⁴⁷。由於 TPP 是美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因此菅首相提出參與 TPP 的主張，可以說是象徵菅政權的外交安保政策開始走向修復美日關係的路線。

此外，菅政權繼承了鳩山政權的方針，將基礎設施的建設視為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重心，而當中的主力項目是核電廠建設，也成功向越南推銷了兩座核電廠。但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了芮氏規模 9.0 的「平成 23 年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平成 23 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以下簡稱為 311 地震）」，地震引發的大規模海嘯造成了位於福島縣兩座核電廠發生輻射外洩等事故，由於危機處理過程反應緩慢、未能確實處理危機，菅政權遭到政學界與媒體的嚴厲批判⁴⁸。可是 311 地震與相關的核電廠事故的處理被認為是導致菅首相在同年 8 月底下台的關鍵之一，菅首相一方面在 2011 年 6 月到 7 月之間先宣示要以不依賴核能為目標，⁴⁹一方面內閣卻在同年 8 月 5 日通過繼續推動核電廠外銷政策的內閣決議，⁵⁰顯示菅政權的理念與實務上有所矛盾。

2011 年 9 月成立的野田政權的對外政策也延續了菅政權，以恢復與美國的關係為主⁵¹。野田首相在 2011 年 11 月的東亞峰會建議，可以在東亞峰會的架構下設置論壇，討論包括東海與南海在內的海洋安全問題的主張（東亞海洋論壇），就被認為事先做好了與美國的溝通⁵²。神保謙認為，野田首相的主張，使得國際間得以建立同時針對東海與南海問題進行對話的場域，也就是東協海洋論壇（ASEAN Maritime Forum, AMF）的召開，日本在當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值得肯定。⁵³

（二）分析

鳩山首相達成的最具體的成果，就是在 2010 年 5 月的日中韓三國領袖高峰會達成了包括設置三國間合作機制的秘書處、至 2020 年為止有關日中韓三國合作方向的政策展望等共識⁵⁴。同時鳩山政權期間的日中關係也看似良好。例如當時在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的主導下，民主黨與中國共產黨不僅進行了交流，小澤幹事長也在 2009 年 12 月率領國會議員團訪問中國。同時小澤幹事長也要求宮內廳打

⁴⁷ 同注 11。

⁴⁸ 黃偉修，〈日本政府在東日本大地震的危機處理〉，《全球政治評論》，第 38 期，2012 年 4 月，頁 47-48。

⁴⁹ 小林良彰，《政權交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 年，再版），頁 102-128。

⁵⁰ 〈原発輸出、既存の案件継続、政府答弁書、新規の結論は先送り、見直し言及の首相と溝〉，《日本経済新聞》，2011 年 8 月 6 日。

⁵¹ 小林，前掲書，頁 137-139。

⁵² 〈東アジア首脳会議 米が主導「中国包囲網」〉，《読売新聞》，2011 年 11 月 20 日。

⁵³ 神保謙，〈外交・安保——理念追求から現実路線へ〉，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民主党政権失敗の検証——日本政治は何を活かす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 年 5 版），頁 157。

⁵⁴ 外務省，〈第 3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の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0/gaiyo_1005.html〉。

破一個月以前提出申請的慣例，使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得以與天皇會面⁵⁵。

但過去自民黨政權的亞洲區域主義政策是以美日關係為核心考量，如果鳩山首相有意推動東亞共同體，那麼最重要的課題將是：如何定位美日關係在整體對外政策的角色。可是鳩山首相直到 2010 年 1 月才開始對東亞共同體進行整體規劃⁵⁶。同時鳩山首相在東亞共同體是否包含美國的問題上不斷做出前後矛盾的發言，例如在 2009 年 10 月上旬表示日本太過依賴美國。但是在 10 月下旬突然又表示沒有排除美國參與東亞共同體的打算⁵⁷。此後的相關政策演說與重要文件之中開始強調美日同盟在東亞共同體扮演的重要角色⁵⁸。

另一方面，美日卻因為印度洋補給油料問題與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而出現緊張。民主黨長期以來反對海上自衛隊前往印度洋對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的聯軍船隻進行油料補給。鳩山首相在上任後也遵守 2009 年大選時的承諾，宣布不延長自衛隊參與印度洋油料補給的法源依據『新反恐特措法』，海上自衛隊在該法的執行期限截止的 2010 年 1 月初撤離印度洋。但民主黨提出的替代方案還是遭到美國駐日大使魯斯（John V. Roos）等美國官員的質疑⁵⁹。

在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方面，美日雖然在 1996 年就已經確定將遷移普天間基地，但直到 2006 年才達成將基地遷移至同樣位於沖繩縣的名護市邊野古海岸的共識。而民主黨始終反對這個共識，認為應該要遷移至沖繩縣外或國外（如關島）。但是鳩山政權內部不僅無法在替代案上達成共識，還出現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黨幹事長、執政聯盟的友黨在未經協調下各自提出替代案而造成政權內部的發言混亂。而鳩山首相也出現前後矛盾的發言，特別是當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在訪日的會談上希望鳩山首相實踐移設邊野古的共識時，鳩山首相先對歐巴馬總統表示：「Trust me」，使歐巴馬總統相信鳩山首相會執行美日共識，卻又於 12 月宣布暫停執行美日共識以尋求新的移設地點，鳩山政權在整個過程的應對也被魯斯大使批判為「不誠實」。最後鳩山首相在無法取得美國的讓步下，只能在 2010 年 5 月選擇重回美日共識，並在 6 月 2 日宣布辭職⁶⁰。

也就是說，鳩山首相的對外政策僅僅只停留在理念層面，而且在沒有規劃整體對外政策的情況下與美國對立。同時，由於安倍、福田、麻生首相都曾經提出

⁵⁵ 〈外交、目立つ中国傾斜、米と関係ギクシャク、習副主席は厚遇〉，《日本經濟新聞》，2009 年 12 月 15 日。

⁵⁶ 〈財務相就任 両刃の剣〉，《読売新聞》，2010 年 1 月 9 日。

⁵⁷ 〈米に依存しすぎていた〉，《読売新聞》，2009 年 10 月 11 日。〈鳩山首相、米国重視を強調 対 ASEAN、東アジア共同体説明〉，《朝日新聞》，2009 年 10 月 25 日。

⁵⁸ 同注 44。

⁵⁹ 〈日米関係「同盟重視」を強調 「米国離れ」に懸念も／ルース米駐日大使〉，《読売新聞》，2009 年 10 月 14 日。〈インド洋給油 8 年きょう撤退、細る日本の人的貢献、民生支援具体化急ぐ〉，《日本經濟新聞》，2010 年 1 月 15 日。

⁶⁰ 整個過程的分析請參閱朝日新聞政權取材センター編，《民主党政権 100 日の真相》（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0 年）；読売新聞政治部，《民主党：迷走と裏切りの 300 日》（東京：新潮社，2010 年）。

過亞洲地區經濟、非傳統安全、環保等方面的多邊合作的建議⁶¹。所以鳩山首相不僅沒有改變日本對外政策的基本架構，東亞共同體的相關政策可以說幾乎是延續過去自民黨政權的路線。

至於菅直人首相提出參與 TPP 的主張後，雖然外務大臣前原誠之、國家戰略大臣玄葉光一郎都曾經說明這項政策的重要性⁶²。但菅政權的前後兩任農林水產大臣山田正彥與鹿野道彥認為，參與 TPP 就必須取消外國農產品的關稅，如此將導致日本農業的崩潰，必須慎重考慮；山田正彥與農林水產副大臣篠原孝也表示菅首相有關 TPP 的發言太過突兀⁶³；甚至連負責經濟政策的經濟產業大臣大畠章宏都表示需要慎重考量參與 TPP 的問題⁶⁴。由於政權內部的歧見始終無法有效整合，因此無法看出 TPP 的加盟在菅政權的整體國家戰略所扮演的定位與角色，最後菅首相任內也沒有正式表明日本參與 TPP。而菅首相在 311 大地震之後卻宣示減少依賴核電，又決定繼續推動外銷核電。宣布推動參加 TPP 與核電政策的矛盾，更顯示了菅首相即使打算以對美關係為對外政策的核心，但是在相關政策方面其實並沒有任何完整、有系統的規劃。

AMF 的召開雖然被評為是日本扮演主導的角色，但也從過程也可以發現，即使 AMF 是日本在亞太地區海洋安全問題的對話上扮演角色，也必須獲得美國的支持，因此野田首相採取恢復與美國關係的對外政策方針，才是相關政策的成功因素。

此外，在日中關係方面，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位首相早已經以「戰略互惠關係（戰略的互惠關係）」的思維推動改善日中關係，也被評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⁶⁵。具體而言，福田首相任內與中國達成了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的共識，日中韓三國也於 2008 年 12 月舉行第一次在 ASEAN+3 以外的領袖高峰會⁶⁶。反

⁶¹ 首相官邸，〈フィリピン公式訪問における内外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12/09philippinespress.html>〉、〈第 169 回国会における福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8/01/18housin.html>〉、〈第 15 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 麻生内閣総理大臣講演 「経済危機を超え、再び飛躍するアジアへ」〉，〈<http://www.kantei.go.jp/jp/asospeech/2009/05/21speech.html>〉。

⁶² 前原誠司，〈経済外交を軸に、開かれた国を目指す〉，《外交》，第 4 号，2010 年 12 月，頁 6-13。玄葉光一郎，〈TPP を奇貨に FTA 交渉を加速化する〉，《VOICE》，第 397 号，2011 年 1 月，頁 96-101。

⁶³ 国家戦略室，〈第 3 回 新成長戦略実現会議 議事要旨〉，2010 年 10 月 21 日，頁 17-18，〈http://www.cas.go.jp/jp/seisaku/npu/policy04/pdf/20101027/20101027_gijiyoshi.pdf〉。山田正彦，〈TPP は農業問題ではなく、国の形が変わる問題なのです〉，《経済界》，第 934 号，2011 年 1 月 11 日，頁 30-31。〈TPP 「あまりに唐突」 篠原農水副大臣〉，《朝日新聞》，2010 年 10 月 8 日。〈農業再生 TPP で溝 実現会議 全中と経済界火花〉，《読売新聞》，2010 年 12 月 1 日。

⁶⁴ 〈TPP 参加、農業改革カギ——政府・与党内、反対論なお〉，《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10 月 28 日。

⁶⁵ 例如：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頁 311-328。天児慧，〈アジア連合への道：理論と人材育成の構想〉（東京：筑摩書房、2010 年），頁 178-180。

⁶⁶ 外務省，〈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協力について〉，〈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press.html〉、〈日中韓首脳会議（概要）〉，〈

觀民主黨執政後，在日中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的細節、釣魚台群島主權等問題上並沒有實質的進展⁶⁷。特別是 2010 年 9 月釣魚台群島海域發生了中國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而導致船長被逮捕的事件時（以下簡稱為釣魚台撞船事件），菅首相卻表示：「民主黨內沒有人可以直接跟戴秉國對話，事情才會變成這樣」，負責處理的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不僅表示外務省與中國之間的溝通管道沒有發揮作用，甚至私下透漏：「民主黨沒有和中國溝通的管道」⁶⁸。所以由此可知，民主黨在政黨輪替前被認為較自民黨接近中國，政黨輪替後也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但日中之間的領土問題等方面並沒有因為民主黨執政後而有實質的進展，民主黨與中國的溝通管道似乎也極為有限。

只是日中之間雖然因為釣魚台撞船事件而出現對立，但整體而言，並不如小泉首相時期那樣惡化。例如 311 地震時，中國不僅派遣了救難隊與提供救援物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於 3 月 18 日前往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訪問，除了表達對罹難者的哀悼之意，在與日本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會談時也表明會持續提供援助；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5 月訪日時，也特地前往東北的災區慰問，並在與菅首相的會談時達成了在包括原子能安全、防災與救災、災區重建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共識。明治大學教授伊藤剛與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就認為，雖然中國可能還是會因為歷史與領土問題而對日本抱持不信感，但中國也可能是希望透過對日本 311 震災的支援，改善日本人的對中感情。日中關係也確實出現了改善的徵兆，以 2012 年為例，雙方的貿易即比 2010 年增加了 22.5%；日本內閣府的調查也顯示，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比 2010 年上升了 6.3 個百分點；日中也開始推動針對東海問題的安全對話⁶⁹。

可是東京都知事（相當於我國的台北市長）石原慎太郎在 2012 年 4 月 16 日於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時，表示東京都要向宣稱擁有釣魚台群島之中的釣魚島、南小島、北小島的地主購買合約，進行更有效的管理。⁷⁰根據報導，石原都知事在 3 月份就向野田首相提及購島事宜，野田首相因為忙於面對推動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問題而無暇因應，直到 5 月份才下令首相輔佐官長島昭久、內閣官房副長官長濱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0812_gai.html >。

⁶⁷ 〈ガス田交渉入り、日中首相が合意、中国譲歩でも時期未定：日本の政権不安で様子見〉，《日本經濟新聞》，2010 年 6 月 1 日。

⁶⁸ 〈中国船長釈放へ いらだつ首相「超法規的措置を」〉，《読売新聞》，2010 年 9 月 25 日。〈フジタ社員釈放、手探り外交に危うさ、官邸・外務省に溝：日中修復、なお懸案多く〉，《日本經濟新聞》，2010 年 10 月 10 日。

⁶⁹ 伊藤剛、高原明生，〈民主党政権誕生以降の日中関係〉，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 1972～2012——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 年），頁 495-497。

⁷⁰ 自稱是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地主，並將這幾個島租借給日本政府的栗原弘行在著書表示，會選擇向東京都兜售而非中央政府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東京都擁有其他地方自治體所沒有的經濟能力與管理所屬離島的實際成效，也因為野田政權當時以解散國會換取在野的自民黨、公明黨支持消費稅增稅的法案，他不願意與不知何時會垮台的政權談判。栗原弘行，《尖閣諸島売ります》（東京：廣済堂出版，2012 年），頁 103-124。

博行、外務省分別與東京都、地主、中國方面進行溝通⁷¹。

野田政權內部評估，如果石原都知事未來可能在釣魚島設置港口設施，將會造成日中之間直接陷入危機，而日本的中央政府卻沒有任何有效的辦法可以制止東京都，只能夠透過推動釣魚台的國有化，才能避免問題繼續擴大（以下簡稱為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因而在 2012 年 9 月推動了釣魚台的國有化⁷²。只是野田首相雖然事前事後都持續與中國進行溝通，除了電話會談外，也陸續派遣外務副大臣山口壯、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杉山晋輔（相當於我國的外交部亞太司長）、外務事務次官河相周夫前往中國訪問⁷³，但釣魚台國有化事件仍然導致了 2012 年 9 月起中國國內一連串的反日遊行，日中的政經關係也一口氣陷入低潮⁷⁴。

2012 年 11 月 16 日，野田首相宣布解散眾議院，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盟在同年 12 月 16 日舉行的大選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於 480 席之中拿下了 325 席，囊括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席次，自民黨總裁（黨魁）安倍晉三於 12 月 26 日當選第 96 代日本國首相，成為了現行日本國憲法實施以來，第二位下臺後再度上臺的首相，民主黨政權僅維持了 3 年 3 個月。

五、 結論

本文檢討了日本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對外政策之中有關亞洲區域主義的發展後發現，無論是經濟或安全層面，自民黨執政期間始終是以美日關係為考量來推動亞洲區域主義。在經濟方面，日本的主要政策包括了推動與 ASEAN 各國的雙邊經濟關係以及與 ASEAN 為中心的各種多邊經濟合作，同時也將中國引導入區域合

⁷¹ 〈尖閣 都と本格折衝 国有化方針 中台、強く反発〉《読売新聞》2012 年 7 月 8 日。〈尖閣、国有化の方針 中国にらみ次善の策 首相、政権浮揚思惑も〉，《毎日新聞》2012 年 7 月 8 日。〈政府、購入合意 指導部交代前、決着急ぐ 中国は「必要な措置取る」〉，《毎日新聞》2012 年 9 月 6 日。〈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² 山口二郎、中北浩爾編，《民主党政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キーパーソンたちの証言》（東京：岩波書店，2014 年），頁 232-239。〈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³ 外務省，〈中華人民共和国——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index.html>〉。〈意思疎通の継続で一致〉，《読売新聞》2012 年 9 月 13 日。〈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⁴ 實際上當時中國國內也有主張冷靜觀察的勢力，也有同意野田政權是為了避免情況惡化才會推動釣魚台國有化的聲音，但高原明生認為，內部的政治鬥爭導致中國最後選擇了強硬的手段因應。高原明生、前田宏子《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⑤ 開発主義の時代へ 1972-2014》（東京：岩波書店，2014 年），頁 189-190。國分良成也指出，當時對日政策成為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的工具，反日遊行背後有周永康等人的影子。國分良成，《中国政治からみた日中関係》（東京：岩波書店，2017 年 4 月），頁 222-224。

作體系視為重要的目標。亞洲的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直到後冷戰時期才開始發展，甚至經濟合作的多邊機制也被認為具有安全對話的功能，但是日本在安全領域始終堅持以美日安保體制。而 1996 年的安保再定義不僅強化了美日的同盟關係，也使得美日在區域與全球的合作關係更加明確，日本國內有關安全保障的相關法令也受到安保再定義的影響。同時日本也持續推動亞洲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ASEAN+3 就是源起於日本的提案。2001 年上任的小泉首相雖然被批評為重美輕亞，但其對亞洲區域主義的立場是延續過去的方向，只是小泉首相對日中關係的看法與過去的政權不同，乃是將中國視為日本在推動東亞共同體的競爭對手。

民主黨在 2009 大選前雖然主張推動所謂東亞共同體，但是相關規劃牽涉到如何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在日本對外政策角色的問題，而鳩山首相不僅沒有進行相關規劃，其推動或提出的政策也多是延續自民黨政權的政策。另一方面卻因為普天間問題基地遷移等問題而與美國失去互信。菅首相雖然提出了參與 TPP 的構想，但對於 TPP 在其整體國家戰略的角色等問題顯然沒有完整考量，之後的野田首相面對著國內的問題，在外交上以恢復與美國的關係為主。這樣的發展，顯示民主黨執政前後提出的亞洲區域主義的相關政策其實並缺乏可行性與系統性，所以最後只能走向重新恢復與美國關係的舊方針。

此外，民主黨執政後的日中關係也看似有所好轉。但自民黨執政期間早已開始推動改善日中關係，日中之間如領土問題等也沒有因為民主黨執政而有所進展。釣魚台撞船事件反而凸顯了民主黨與中國之間的溝通管道極為有限；釣魚台國有化更導致了日中關係陷入低潮，釣魚台問題目前也成為了日中之間發生對立的火藥庫。

所以本文的結論可以整理為三點。第一點，2009 年以前的自民黨政權推動亞洲區域主義的相關政策時，是以美日關係為主軸，並將中國引入區域合作以穩定日中關係，只有小泉政權例外地將中國視為日本推動區域合作的競爭對手。

第二點，無論是鳩山首相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或是日本對外政策基礎的美日關係、同為重要關鍵的日中關係，民主黨執政期間所推動的政策不但沒有達成具體的成果，從過程中反而可以看出民主黨對相關政策並沒有系統性的規畫與思考，導致了鳩山政權期間美日之間失去互信，甚至連日中關係也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發生了影響至今的對立。

第三點，菅、野田政權最後重返了過去自民黨以對美外交為核心的方針，代表日本任何政黨執政，都難以改變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對外政策架構。

安倍晉三帶領自民黨重回執政至今已經快要 5 年，可以說是冷戰結束後僅次於小泉政權的長期政權，安倍首相在上任之初，強調要更加鞏固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礎的美日同盟，恢復美日之間的羈絆，並主張「外交的基本方針，不只是關注到與周邊各國的雙邊關係，要有如眺望地球儀似的俯瞰整個世界，立足於自由、

民主、基本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以推動戰略外交」⁷⁵，安倍首相的主張普遍被稱為「地球儀外交（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主張看出，安倍首相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石推動外交安保政策。可是透過本文的分析就可以了解，日本推動亞洲區域主義的主要關鍵之一的日中關係，已經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因為釣魚台問題而出現了延續至今的對立，南海的主權爭議問題從 2012 年起越來越深刻，北韓與恐怖主義對全球的威脅更是日益深刻，甚至美日關係也因為 2016 年上任的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推動了宣布脫離 TPP 等政策而出現了不明朗的局勢，可以說安倍首相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自民黨執政期間完全不同，而且是一個更為艱難的國際環境戰略。安倍首相如何在這樣的國際戰略環境下推動「地球儀外交」與亞洲區域主義等外交安保政策的相關問題，也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⁷⁵ 首相官邸，〈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附記

本論文中文版初稿曾發表於 2010 年 11 月 25、26 日舉辦的《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日本研究中心暨第一屆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年會》，日文版〈日本の對外政策におけるアジア地域協力〉曾刊登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現與校內其他相關研究機構統合為「地域・地域間研究機構」）出版的《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第 9 號（2011 年 2 月）。筆者在經過早稻田大學地域・地域間研究機構許可後，將日文版論文重新改寫為中文，並增補相關內容。感謝天兒慧老師（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高原明生老師（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老師（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佐藤考一老師（日本櫻美林大學教授）、平川幸子老師（日本早稻田大學副教授，當時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助理教授）、張望老師（日本早稻田大學副教授，當時為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研究助手）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給予的指導與協助，也感謝許介麟老師（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嚴震生老師（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阿南友亮老師（日本東北大學教授，當時為日本東京成德大學講師）、増田雅之老師（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在中文版初稿發表時給予的批評與指教。本論文也是筆者擔任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學術振興會基盤研究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 A「対中依存構造化と中台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ポスト馬英九期台湾の国際政治経済学」(研究代表:松田康博 課題番号:16H02005) 協同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歷

黃偉修 **Wei-Hsiu Huang**

學 歷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現 職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 台灣的大陸政策決策過程、兩岸關係、日中關係、日台關係、日本外交與安全政策。

官方網頁 <http://www.ioc.u-tokyo.ac.jp/faculty/prof/whhuang.html>
<https://weihsiuhuang.jimdo.com/>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2017 年 8 月 1 日創刊

出版日：2017 年 8 月 1 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 麗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偉修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ugust 1, 2017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ugust 1, 2017 Vol. 1 No.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Asian regionalism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LDP and DPJ administration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